

# 角色转型·权势迁移·遭逢巨变： 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聚集的动力机制

梁君思<sup>1</sup>

**【摘要】**：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轮廓的勾勒、坐标定位的呈现及其功能作用的揭示，离不开对其聚集动力机制及其可能空间的考量。作为介于五四知识分子与延安知识分子之间且具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中共知识分子，其与赣南闽西乡村社会关系及文化权力网络具有高度同构性、共生性。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是民国知识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知识人并不构成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的第一身份。中央苏区时期在力量上并不占据优势的政治人，不得不凭借其知识人、社会人的“身份”支援、掩护和推进中共革命。因此，从角色转型下的合群及其跃迁、权势网络下的声望及其呈现、遭逢巨变下的必然及其偶然三个维度对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聚集的动力机制予以分析，有利于从新的视角、变量、路向找寻中共革命宏观叙事之下的微观面向及其阐释空间。

**【关键词】**：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 聚集条件 角色转型 权势迁移 遭逢巨变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20）05-0131-09

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主要是指曾活动于中央苏区史地空间，并在进入中央苏区之前接受过中等及以上教育，在思想、行动上认同中共意识形态，经历过革命战争洗礼并为中共革命作出过特殊贡献的人文、技术、军事类知识分子<sup>①</sup>。身处赣南闽西乡村社会“差序格局”<sup>②</sup>的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与身处颇具同时性（Simultaneity）和并置性（Juxtaposition）<sup>③</sup>特征现代都市生活的同时代民国知识人明显不同。作为介于五四知识分子与延安知识分子之间的特殊样态，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聚集的动力机制呈现出从依靠地缘、血缘、学缘、业缘等传统社会关系权势网络向现代政党组织模式过渡的鲜明特征。从知识分子角色转型下的合群及其跃迁、权势网络下的声望及其呈现、遭逢巨变下的必然及其偶然三个维度对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聚集的动力机制予以厘清，既能从新的维度寻找隐藏在中共革命宏观叙事下特殊群体的演化路径、作用机理、微观脉络与细节呈现，又能从新的视角、变量、路向为解释中共革命的微观面向提供新的可能<sup>④</sup>。

## 一、角色转型下的合群及其跃迁

从士大夫向知识分子的角色转型来看，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孕育”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胎胞”之中。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后，脱胎于士阶层的新型知识分子试图在新的时空格局下寻求新的社会位置。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逐步边缘化的过程中，传统士大夫阶层的余晖仍然是其社会作用发挥的重要“底色”。科举废除不仅意味着旧的政治晋升机制被摧毁，也意味着旧的价值理念业已失去制度根基。知识分子的角色转型，便是其在寻求新的政治晋升渠道及价值选择中展开的。辛亥革命爆发后大一统帝国政治体系的坍塌，使得凝聚社会共识的文化信仰体系随之坍塌。正如余英时所言：“现代社会一方面变得非常复杂，一方面又失去了以前那种整合性的信仰（如上帝、天、天理之类）”，而且“由于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偏于大群体，近代知识分子比较容易为社会主义的理想所吸引。这种观念一旦征服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自然便进一步成为他们行动（革命）的指南针”。<sup>⑤</sup>因此这一时期，处处呈现出一个正统衰落、边缘上升的趋势，中国社会、思想的“权势转移”<sup>⑥</sup>业已呈现。

**作者简介**：梁君思，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复旦大学统战理论研究基地研究人员，主要从事中央苏区史、知识分子问题研究。

**基金项目**：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项目号：17YJC710044）的阶段性成果。

---

原处于传统帝国政治体系边缘的留学生逐步取代了旧式读书人的文化权威。随着 20 世纪 20 年代留苏高潮的兴起以及其后留学生的大批回国，留苏知识分子在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中占据重要影响。“整合性信仰”下的文化转向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自觉认同，构成了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聚集的重要驱动。

一是，集体行动下的思想跃迁。在知识分子谋求新的社会位置和角色转型过程中，形成了多种具有权势网络意义的共同体，他们或以宗族关系<sup>(4)</sup>保护自身利益，或以政治联盟<sup>(5)</sup>寻求关系网络，或以“知识传播的组织与传播机制”<sup>(6)</sup>聚集成群。随着现代中国思想、学术、社会权势的转移，“学会、学校与报刊成为此一时期”知识分子“合群”<sup>(7)</sup>的主要载体，并日益成为占据重要影响的集团力量。从合群载体上来看，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脱胎于新式学堂兴起所带来的思想跃迁之中。在科举时代，由于学额施行区域配给制，考生本籍应试的要求使得考生与家庭纽带极为牢固。传统熟人社会网络下“子弟读书，家塾有父兄之督责，师长之教训”<sup>(8)</sup>的逻辑相对自洽。民国初期新式学校的分布虽然大致延续清末格局：乡镇有小学，县城有中学，省会有高中、师范甚至大学，大城市有相对好的大学。但是，考生应试相较于科举时代明显松动，各地学生可以直接投考县城、省会的学校，这为乡村学生踏出乡关远赴省城或中心城市读书提供了可能。新式学堂带来的不仅是同学之间年龄差距的逐步缩小，而且在学费、地域因素的作用下，同一类型学校同学之间的家庭背景相差不会太悬殊。这些变化使得在年龄差距、人生经历、经济地位<sup>(1)</sup>、地缘结构等方面相对接近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极易产生思想上的共鸣。学校成为青年知识分子主要的合群载体，同学关系成为重要的社会关系网络。由于新式学堂大多集中分布于省会、沿海城市等书刊报刊流通相对畅通的区域，这便意味着革命新思想极易被青年学生所获得。这些位于城市空间、聚集学校具有相同年龄、背景、阅历的青年学生，在新思想的影响下获得了同时代人“集体行动”<sup>(2)</sup>的逻辑。随着军阀混战的日益加剧，在学会、学校、报刊等知识传播组织与机构聚集的知识分子，以学校为中心纽带、以城市为空间场域宣传革命。地理位置上的空间阻隔与文化思想上的极速转变，使得这些知识分子与家庭的纽带逐步松动。当这些青年学生返回家乡后，却发现自己的阅读世界、思想资源、行为逻辑与传统社会格格不入，在这种新旧思想的决裂中，先进知识分子成为传统制度的“挤压”下迸发出的反叛力量。

二是，合群方式转换下的信仰跃迁。知识分子在谋求新的社会位置和角色转型过程中，形成了具有某种身份超越意义的跃迁，他们或以同乡、同县、同省等地缘网络为依托合群，或以政界、商界、报界、军界等业缘网络为载体合群，或以政党组织信仰规约为载体合群。这些合群方式，构成了知识分子在新的政治体系下寻求社会位置的多种选择。而且，这些不同类型合群方式在同一个时空场域中叠加呈现、交织影响。与血缘合群方式相比，地缘合群突破了血缘聚集的局限并扩大了聚合空间。与地缘合群方式相比，业缘合群突破了地缘聚集的局限并成为更具社会吸纳能力的合群方式。随着社会力量的成长及其分化，政界、商界、军界、报界等以界为识别标准的社会群体划分方式逐步形成。从地理上不断突破乡界、县界、省界的地缘合群到商界、学界、政界等业缘合群方式的转变，标志着知识分子合群方式由地缘身份切割转换为社会身份切割。大致说来，“‘省界’实际构成‘合群’之先声，成为近代中国集团力量形成最初的征兆”<sup>(3)</sup>。但是，以地理空间、行政区划为边界的地缘合群方式和以社会分化、职业身份为边界的业缘合群方式，仍然存在着辐射半径、整合范围的局限，或团结一地一城之群体，或聚集一行一业之力量。因此，具有现代化意蕴且超越血缘、地缘、业缘合群方式局限的政党组织形态开始在知识分子的合群方式中占据优势。特别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传播的深化及列宁政党组织样态的引入，使得先进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以政党为载体合群。从合群载体辐射半径的跃迁上来看，政党组织内生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合群方式的新陈代谢之中。从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的信仰跃迁来看，其孕育于大一统国家体系坍塌之际知识分子群体的自觉转向之中，跃迁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与新式教育推广的知识转型时期，成熟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正式提出之际。

三是，信仰遵循之下的行动跃迁。知识分子在谋求新的社会位置和角色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学术政治化、信仰政治化和政党学术化、主义学术化的时代语境。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个意识形态高度参与的时代，是一个“主义的时代”<sup>(1)</sup>。在各方政治力量挟其主义凝聚民众共识、汲取社会力量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遵循构成了知识分子奔赴中央苏区史地空间的重要驱动。中共创党时期，共产国际已然认识到国民党“自从清朝统治失败以来”，因“民族主义表现得不再那么强烈”而“在知识分子中的号召力大大减弱”<sup>(2)</sup>。国民革命蓬勃发展的关键条件之一，在于国共两党对民族主义思潮情绪的及时回应与有效运用。在国共两党的主义之争中，坚守初心使命、以信仰遵循规范自我的行动跃迁构成了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聚合的动力机制。例如，1926 年 5 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蒋介石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整理党务案》通过，中共党员纷纷提出辞职。

当时已申请退出国民党的江西籍共产党员钟赤心找到江西区委书记（江西省委前身）刘九峰说：“黄埔军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中有一部分不愿退出共产党的江西籍同志，他们想回原籍工作”<sup>(3)</sup>，李九峰当即安排工作并向吉安党组织开具介绍信。1926年6月，陈奇涵、肖韶、钟赤心、肖万侠、陈奇洛、鄢日新、曾新全等结伴同行，于月底到达江西会昌。陈奇涵在《自传》中曾言：“当时，我们之所以能转回江西，主要是由于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同情革命和秘书长孙睿明（共产党员）的安排起了决定的作用。”<sup>(4)</sup>国共合作破裂后，国共两党革命、反革命的道义争夺和主义比拼的实质是对民众信仰的争夺。1929年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中国之后，其保守倾向逐步暴露，并日益失去号召力。作为中国苏维埃运动大本营的中央苏区，既是那些接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信仰、受社会主义理想所吸引以及对旧制度旧思想持尖锐批判态度党外知识分子所向往的革命中心，也是中共党员知识分子经历沿途艰险、倾心向往的革命圣地与精神家园”。例如，李克农在顾顺章叛变后进入中央苏区，当他看到村舍树梢上飘着一面标志着镰刀斧头的红旗，感到全身热血沸腾，心中喃喃自语：“我李克农回到家了，回到家了！”<sup>(5)</sup>

## 二、权势迁移下的声望及其呈现

从士大夫向知识分子的角色转型，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上逐步走向边缘。原本集社会权势、思想权势等政道传统于一身的士大夫阶层，开始分化为占据思想权势的知识精英和占据社会权势的政治精英。因科举废除而被阻断了政治晋升之路的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合群聚集力量并在新的政治体系中谋求新的社会位置。“虽说将学问等同于社会地位与权势的观念，随着科举制度的瓦解已不再那么牢固”，但当“学问达到公认地位，也步入了晋升之阶梯”。<sup>(6)</sup>换言之，社会各界对知识分子社会作用的发挥仍有所期待<sup>(7)</sup>，这为传统社会关系权势网络的激活提供了政治空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的暴力“分共”使得中共组织网络被打散，在政党上下断层、沟通梗阻、党员失联、组织涣散的危机情况下，非政党形态血缘、学缘、地缘、业缘合群方式的激活，既为中共组织网络的接续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也为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的聚集提供了可能。

（一）传统血缘、业缘、学缘、地缘权势网络作用的发挥为知识分子群体聚集中央苏区史地空间提供了合群的“声望”载体

一是，传统亲属宗族等血缘结构下权势网络的“声望”与“掩护”。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组织关系被打散，亲属宗族成为地方知识分子党员在组织“失联”后保存、积蓄革命力量的重要掩护。中央苏区初创时期，地方知识分子在基层组织中占据重要权重。在1929年赣南2500名党员中，知识分子、富农、地主达1072人，占42.29%；在1930年赣南7000名党员中，知识分子有1835人，占据26.2%。<sup>(1)</sup>从家庭背景上来看，这些知识分子大多出身富裕家庭。据赖传珠回忆，“赣州参加党的很多同志是小地主家庭出身的”<sup>(2)</sup>；陈奇涵回忆道：当地群众流传着“穷人不闹，富家子弟大闹”<sup>(3)</sup>的说法。思想的超越性与身份的特殊性构成了知识分子与传统家庭宗族之间极为复杂的关系，借助本地家族的庇护保存革命火种、发展革命力量成为非常态革命时期的常态。正如萧华回忆时所言：“这种姓氏关系，有效地掩护了革命势力的生长与发展。”<sup>(4)</sup>

二是，传统尊师重教等业缘结构下社会网络的“声望”与“掩护”。在外求学归乡的知识分子在赣南闽西地区享有较高的声望，当地居民“对真正革命的知识分子，尊之为老师”<sup>(5)</sup>。赣西各地苏维埃乡村政权，极大多数在新学生之手，“这些知识分子在农村地位最高，又大多是共产党党员”<sup>(6)</sup>；赣西南“干部大部分是知识分子”，有的地方甚至“成份完全是知识分子”<sup>(7)</sup>；万安“农民运动是少数知识分子所发迹，故农民群众对于‘老师’（该县对知识分子的尊称）有很大的信仰”<sup>(8)</sup>。地方知识分子在恢复重建基层组织过程中，充分借力赣南闽西地区尊师重教传统掩护革命火种。例如，1927年冬古柏等人在寻邬建立了中共寻邬支部。为便于开展革命，古柏等利用合法形式在寻邬城南石溪书院创办了中山学校（不久改名中山中学），聘请当时颇具社会地位的开明绅士曾有兰为校长。许多共产党员担任中山中学教员，宣传马列主义，组织革命，“土豪劣绅虽然对中山中学不满，但因校长曾有兰是寻邬伪县长的老师，对此也无可奈何”<sup>(9)</sup>。

三是，教育学习经历等学缘结构下社会网络的“声望”与“掩护”。陈奇涵曾回忆：赣南早期中共党员李加竇，其父亲“李炳灵是日本留学生，在当地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尤其是受到李氏家族的敬重”，“利用李加竇家里的社会地位，掩护党的秘密活动，是必要的，也是安全、有利的”<sup>(10)</sup>。而且，学缘关系对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也产生重要影响。例如，在国民党二十六军

中最初与上级保持联系的中共党员仅刘振亚一人，其后“上级党组织通过同乡、同学等关系”不断打入中共党员并建立地下党组织，“用个别交朋友和单线联系等方法”<sup>11</sup>发展中共力量，赵博生入党后“利用与董振堂同乡、同学和旧交的关系”做团结董的工作，董振堂表示举兵起义后“协助赵博生做争取季振同的工作”<sup>12</sup>。

四是，“白皮红心”策略等地缘结构下社会网络的“声望”与“掩护”。从客观环境和现实条件出发，采取机动灵活的策略是当时中共在军事力量处于弱势时期重要的生存经验。例如，全国解放初期陈奇涵在给兴国首任县长李贻树的信中指出：当时知识分子采取“白皮红心”策略参加国民党地方政权，为中共革命提供掩护，“不要被他们长袍马褂出入公门，经常与反动派接近的假象所迷惑”<sup>13</sup>。又如，三点会在兴国地区颇具影响，陈奇涵与黄家煌、肖以佐、鄢日新、李明兰等知识分子打入三点会，并将其改造成重要的革命力量。再如，1934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鄂豫皖苏区委员会的信》中曾言：“老百姓挂白旗的情况不应阻挡我们特别重视这些地区，因为旗子的变换大多是纯表面上的，群众指望这样做可以避免遭杀戮。”<sup>14</sup>

（二）传统血缘、业缘、学缘、地缘社会网络为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结构调整与中共政治吸纳提供了重要的“声望”基础

一方面，知识结构、教育背景占据优势的知识分子不仅在“组织权力”结构中占据优势，而且在思想信仰结构中也占据优势。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旧读书人与留学生之间的社会转移已然完成，留学生在新式学堂教育体系中占据重要发言位置。<sup>15</sup>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中具有一定的学缘等级结构，存在“等级序列”的威慑力。在权力序列中，留学知识分子比本地知识分子有威慑力。例如，留苏知识分子“来到苏区，往往有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在中央苏区给人一种威慑力。常年在苏区的党政干部大部分感觉自己是土包子，简单地认为中央派来的人水平高，不自觉地心理上觉得要听从中央来的人的命令”<sup>16</sup>。在思想序列中，学识高的大知识分子对小知识分子具有威慑力。例如，1931年1月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从张辉瓒师解放过来10名电台人员，毛泽东、朱德、朱云卿等亲自与王净、刘寅谈话。参谋处长郭化若若是黄埔生，做知识分子工作很有效果。被李先念赞为“半部电台起家，一生征战为民”的王净回忆：“开始工作后，朱总司令几乎每晚都要来和我们谈话，讲述革命道理和当时形势。”<sup>17</sup>

另一方面，知识结构、教育背景占据优势的知识分子不仅在培育革命知识分子、争取外来知识分子中占据优势，而且在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教育团结方面也产生重要作用。从整体上来看，国民党军事人才队伍占据优势，蒋介石中央军构成主要有以陈诚为代表的保定系（保定军官学校）、以汤恩伯等为代表的日本士官系（日本陆军军官学校）、以胡宗南等为代表的黄埔系（黄埔军校）、以程潜和康生智等为代表的讲武堂系（云南讲武堂及各省讲武堂等）四个部分。中共除了自己培养军事人才外，还要对国民党各类知识分子人才资源进行争取。中共在对军校生知识分子团结、整合、吸收的过程中，有着教育背景及其经历的考量。例如，在宁都起义后，“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军官，欢送，发给路费，来去自愿”<sup>18</sup>。为帮助起义部队整顿和改造，毛泽东对何长工诙谐地说：“他们相信日本军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军校的人。因此，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压压台。”<sup>19</sup>于是，中革军委派了有改造旧军队经验和留学经历的刘伯坚、左权、宋任穷、朱良才、程子华、朱瑞、唐天际、赖传珠等去工作。这些派去的知识分子干部，与参加宁都起义的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七十四旅一团团长黄中岳相比，学历结构上有“梯度”，能够起到“压台”的效果。而且，特殊的业缘经历也为宁都起义的胜利夯实了基础。例如，第二十六路军原属冯玉祥西北军，刘伯坚等共产党员曾在西北军工作过，宁都起义后不久，季振同曾对萧劲光说：“我参加红军，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是相信刘伯坚。”<sup>20</sup>

总之，作为遵循列宁建党原则创立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共严密的组织原则和纪律刚性使其在与传统社会关系网络的比拼中占据显著优势，展现出强大的信仰感召力、组织内聚力与社会动员力。在大革命失败后国共两党的军事对峙中，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借助传统社会“非政党”社会关系有效地弥补了刚性政党组织被打散后的涣散混乱，为掩护中共组织再造赢得了政治空间。虽然，中共在组织网络恢复时曾因传统社会关系的历史惯性与内在张力所累。但是，中共知识分子精英在借助宗族、家

族等传统社会网络恢复、重建政党组织过程中作出过扬弃这一“胎胞”消极因素的努力。例如，1931年2月11日中共赣东北特委通告（第十二号）就一再强调“苏维埃政权”对传统社会关系的超越：“苏维埃政权是革命的政权，要唤起群众对于选举非常郑重，极力反对一切私人关系——宗教、朋友、亲戚等关系的作用。”<sup>①</sup>需要注意的是，中共组织网络被“打散”后能够迅速激活知识分子传统社会身份下“非政党”社会网络为政党再造助力而又不被地缘、学缘等因素“所累”的关键，在于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马克思主义信仰支撑下初心使命的践行。正是基于思想的超越性与个体的能动性，才使得中共在借助传统社会关系掩护、积蓄革命力量的过程中超越合群方式的局限。反观“分共”后的国民党，无论是在乡村基层的治理还是在高级军官将领的关系维护上，深受血缘、地缘、学缘、业缘等传统社会关系权势力量的牵绊与掣肘。

### 三、遭逢巨变下的必然及其偶然

在中央苏区疆界版图变动不居、社会结构剧烈变迁、内外因素瞬息万变的复杂环境下，中央苏区知识分子个体的行动轨迹、角色空间、生存际遇、思想再造、信仰践行呈现出千差万别的样态。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既是在当时中共革命中客观涌现出来的一股政治力量，又是政策执行过程中极易被卷入的一个群体。因此，在考察这一群体聚集动力机制的过程中，既不能忽视知识分子思想、行动背后所涉及的复杂社会关系网络，也不能低估遭逢巨变历史总体趋势下偶然发生的随机事件、集体行动与个体选择。

从知识分子身份政治的维度来看，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的角色转型、身体行动、身份转换、思想跃迁可以视之为民国知识人谱系中的特殊呈现。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是民国知识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知识人”并不构成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的第一身份。作为中共党史人物整体肖像一部分的中央苏区知识分子，其第一身份是“政治人”。1929年至1934年间在力量上并不占据优势的“政治人”，不得不凭借其知识人、社会人的“身份”支援和掩护推进其政治理想的实现。在从士大夫政治向军阀政治、政党政治转型的过程中，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每一个生命个体，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到现代化潮流之中。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那些与现代化趋势相违背的因素都会遭遇巨大的冲击。资本的力量试图将一切不符合市场原则的阻隔打碎，军事的力量试图将一切不符合军事原则的阻隔打碎，政治的力量试图将一切不符合政治原则的阻隔打碎。在新与旧的决裂中，革命以政治、军事暴力的形式摧毁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经济、军事、政治力量势如破竹、摧枯拉朽，似乎能够彻底改变旧体制旧机制旧传统下的桎梏，似乎能够彻底摧毁和碾压知识分子生命个体的经济基础、生存境遇与思想空间。但必须要看到，在新制度与旧山河的对抗、调试、磨合之中，极具离散化特征的知识分子却在借力血缘、地缘、学缘等传统社会关系网络基础上接续中国的政道传统。正如余英时所言：“这种变动只是表面的、形式的；一个社会和其中的无数个人不是在政治结构改变之后便能在刹那间完全脱胎换骨”，而且“政治力量所造成的改变仅限于表象，实际上无论是经济、文化、社会或心理等等都不是政治所能解决的”。<sup>②</sup>新的政治力量摧毁旧制度、旧秩序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正如知识分子在新的政治格局中寻求新的社会位置时所面临的困境一样，在接受和践行新思想、新制度的过程中不得不借助于血缘身份、地缘身份、学缘身份等传统社会关系网络的形式方能使之顺利推进。

从知识分子合群载体的转换来看，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聚集动力机制呈现为血缘、地缘、业缘等非政党因素与现代政党之间偶然的碰撞接触与必然的互动补充。现代政党凭借组织结构上的先进性，虽然将传统社会关系网络及其合群方式挤压到边缘，但处于被压制状态的传统社会关系网络并未完全消失，它们或处于政党政治体系边缘持续作用，或者处于潜伏状态“伺机而动”，或者借助政党组织形式获得新的生命样态。在国民革命时期凭借先进政党组织形式蓬勃发展的国共两党从未将血缘、地缘、学缘等非政党合群方式完全“挤压”出革命阵营，反而要借助传统合群方式补足政党政治体系中的短板。国共合作破裂后，占据军事力量优势的国民党将中共的军事力量挤压到乡村边缘，但却无法将其政党力量彻底挤压出城市空间。中共在大革命失败后组织失联、沟通不畅的情况下，借助传统社会关系网络恢复、重建、再造政党力量；国民党在强化军权控制过程中也不得不借助传统社会网络维系高层武人关系与基层统治。所不同的是，国民党在借助传统社会关系过程中反被其所累，并在与传统习惯、信仰体系的勾连中逐步走向保守僵化；而中共则更加坚决、彻底地再造政党，不但未被传统社会网络所吞噬，反而将完全异质于传统关系网络的苏维埃政权强行嵌入乡村社会之中。因此，对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聚集动力机制的分析，必须考虑血缘、地缘等传统社会网络这一维度而又不能完全停留于这一维度。换言之，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在探索新旧组织形态

“最佳”整合方式的过程中，以血缘、地缘等非政党因素与政党因素的互动的形式呈现其群体聚合的动力机制。

从知识分子聚集与消散的过程来看，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聚集的动力机制以偶然的形式呈现在诸多历史事件的正误相杂之中。就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的概念指涉而言，外在的社会评价与内在的自我标识之间是有距离的。虽然近代知识分子在代际更替间或多或少地接续着士大夫的余晖，但接续五四传统的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已然在出生籍贯<sup>(1)</sup>、教育背景<sup>(2)</sup>、年龄结构<sup>(3)</sup>、命运走向<sup>(4)</sup>上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然而，新旧知识分子在思想、身份上的分野要比区划、教育、年代、走向上的分野要复杂的多。思想的隐蔽性和身份的重叠性，使得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的驱动机制呈现出极为复杂的面向。虽然新型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已然超越其经济基础，但在物质载体上却又不得不借助家庭、宗族等传统社会结构中的权势地位来掩护、推进革命。中央苏区时期各苏区千差万别的组织重建模式，体现出知识分子借助传统宗族网络、乡村熟人社会关系再造政党时对偶然性际遇的灵活把握。从其群体数量的减损来看，知识分子极易被卷入各类政治运动。中央苏区时期的许多政策制度并非是针对于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极易被随机事件所裹挟。例如，在肃反 AB 团中虽有部分知识分子被卷入，但这一事件初衷并非针对知识分子。再如，在清理富农中农、查田运动中的误杀，或者革命战争中牺牲的知识分子，都可以使之被卷入革命洪流之中生命个体的偶然事件。因此，既不能把随机事件与知识分子被卷入的偶然归结为知识分子在中央苏区史地空间聚集或消散的普遍性或特殊性原则；又不能把握其聚集动力机制时忽视偶然因素所遮蔽的运行机理与具体细节。

从知识分子的个体化差异来看，聚集中央苏区史地空间的动力机制大多呈现出必然性与偶然性交互作用下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具体表现为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出生籍贯、家庭环境、教育经历、成长条件、革命经历、思想转变、阅读世界、人际网络、社会资源等诸多要素排列组合之下难以采取统一标准划归的诸多偶然。因此，个体性既是展现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普遍性、特殊性的应然，亦是其个体化、离散化历史存在的实然。厘清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普遍性、特殊性的前提是对知识分子个体性因素进行化约，但用规律、趋势、类型、合群、分类、模型等来概括和描述知识分子群体聚集的动力机制难免失之刻板，甚至用群体这一概念来涵盖极具离散化特征知识分子个体亦是权宜之计。即便是接续知识分子聚集动力机制的逻辑继续追问其思想、行为的形成与演变，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复杂交织。无论是教育成长经历，还是思想、行动的跃迁，每一个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截然不同。例如，杨成武生在福建长汀农民家庭，儿时读私塾，后来从私塾转学，与两个堂兄弟在上杭县回龙圩教会小学读书。杨成武回忆道：“我的一位远方叔伯伯哥哥杨能昆，从福州政法大学毕业，回到长汀，在公立师范学校当教育长，于是我就同他的弟弟以及他的一个朋友的儿子一起去长汀上学”<sup>(1)</sup>，1929年4月张赤勇到福建省立第七中学（长汀）宣传革命时，杨成武与其他进步学生随即参加革命<sup>(2)</sup>。

#### 四、结语

李大钊曾言：“苟欲澈知其人思想的由来，必须就其人的气质、品质、家系、血统乃至亲缘、师友，一一加以考察。”<sup>(3)</sup>作为介于五四知识分子与延安知识分子之间具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中共知识分子，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聚集的动力机制呈现出从依靠地缘、血缘、学缘、业缘等传统社会关系网络向现代政党组织模式过渡的鲜明特征。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聚集的动力机制大致呈现出踏出乡关、学堂合群、思想跃迁、投身革命、遵循信仰、身份跃迁、遭受冲击、隐藏边缘、寻得掩护、再造政党的路线图。但也存在着出生籍贯、家庭环境、教育经历、成长条件、革命经历、思想转变、阅读世界、人际网络、社会资源等诸多要素排列组合之下难以划归的诸多偶然。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的第一身份是“政治人”，但在1929年至1934年间力量上并不占据优势的“政治人”，不得不凭借其知识人、社会人的“身份”支援、掩护和推进中共革命。因此，从角色转型下的合群及其跃迁、社会网络下的声望及其呈现、遭逢巨变下的必然及其偶然三个维度对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聚集的动力机制予以厘清，既能从新的维度寻找隐藏在中共革命宏观叙事下特殊群体的演化路径、作用机理、微观脉络与细节呈现，又能从新的视角、变量、路向为解释中共革命的微观面向提供新的可能。

#### 注释：

1 笔者以边界化约为方法、以数据呈现为中心、以史料呼应为线索追溯其群体轮廓及聚集的动力机制。在方法上，将“中央

---

苏区知识分子群体”概念化约并拆分为以下可操作性指标：曾活动于中央苏区史地空间；在进入中央苏区之前接受中等及以上教育；在行为、思想上与中共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经历过革命战争洗礼；为中共革命作出过特殊贡献；人文、技术、军事类知识分子。在史料上，爬梳《中央革命根据地词典》（档案出版社，1993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人物志》（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红军人物志》（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中共党史人物传（1-89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中央苏区人物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以及江西、广东、福建、湖南等地方档案馆及党史部门相关资料，同时辅之以人物年谱、传记、回忆提及信息中符合筛选“指标”的知识分子。在步骤上，通过对以上史料所载中共党史人物基本信息的提取，筛选并形成了649名符合“指标”的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名录，基于此样本数据统计分析提供的线索进一步追溯史料，反复比照、多方印证。本文所举证之数据，若无特殊说明均出自此处。参见梁君思：《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9年。

2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三联书店，1985年，第21页。

3 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包亚明主编：《都市与文化第1辑：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陈志梧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8页。

4 近年来，学术界有关“身份政治”“集体行动”“基层社会”“民众主体性”“革命史与大乡村史相结合”等维度的探讨对理解中共革命颇具启发。但借鉴新革命史理论与方法，从知识分子维度切入研究中共苏区革命微观面向的成果相对薄弱。参见黄金麟：《政体与身体——苏维埃的革命与身体（1928-19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丸田孝志：《革命的礼仪——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政治动员与民俗》，东京：日本汲古书院，2013年；应星：《“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社会》2016年第4期；李金铮：《“新革命史”：由来、理念及实践》，《江海学刊》2018年第2期。

5 余英时：《论文化超越》，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34、135页。

6 罗志田：《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页。

7 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赵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页。

8 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谢亮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76页。

9 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文化面面观》，赵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页。

10 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全新修订本）》，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第53页。

11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8页。

12 虽然同一所学校学生之间的经济地位相近，但是也存在一定差异。例如，出身贫困的刘亚楼，面对福建省立七中高昂的学费以及“小上海”汀州的生活开支，“节衣缩食，并常为富家出身的同学代做作业，换来几顿饭或零碎铜板，但还是免不了辍学的命运”。参见钟兆云：《刘亚楼故事》，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4年，第5页。

13 “那时，于都县城的豪绅地主互相间勾心斗角，你争我夺，大家都抓住学校不放，各自将学校作为培植自己势力的阵地，有意在学校之间和学生之间制造矛盾，利用学生为他们的派系斗争服务。县城的昌村中学、昌村小学和于水中学、于阳小学等4

---

所学校，形成为昌村派和于水派，两派系学生之间各不来往，互相仇恨，矛盾一触即发。”肖大鹏与于水中学、于阳小学进步学生李骏、张文焕、高克勤等人一起，揭穿豪绅地主阴谋估计，消除学校学生间隔阂，使得4所学校学生运动迅速开展，不少同学成为其后于都县革命运动的骨干。1926年12月上旬，肖大鹏和李骏、黄剑锋等同学一起入党。参见卢仕俊、王享、凌步机：《洗却沉冤是英雄——记红二十军代理军长肖大鹏》，中共赣州地委党史办公室、赣州地区民政局编：《赣南英烈》（第1辑），赣州印刷厂，1988年，第98页。

14 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全新修订本）》，第55页。

15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4页。

16 《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料（1917~1925）》（第2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235-236页。

17 《陈奇涵传》，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0页。

18 《陈奇涵传》，第20页。

19 《李克农自传》，存国家全部档案馆，转引自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精选本》隐蔽战线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第172页。

20 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全新修订本）》，第372页。

21 Y. C. W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1972-1949,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6.

22 《黎日晖关于赣南工作的综合报告》（1931年10月6日），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1年》甲，1988年，第159、216页。

23 赖传珠：《赣县革命斗争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赣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赣县文史资料》（第1辑），1991年，第14页。

24 陈奇涵：《赣南党的历史》，陈毅、肖华：《回忆中央苏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页。

25 萧华：《兴国革命斗争与“少共国际师”》，《回忆中央苏区》，第390页。

26 《江西工农革命之白热化》（1928年2月2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印：《江西党史资料》（第4辑），1987年，第110页。

27 《刘作抚关于赣西情形的综合报告》（1929年9月6日），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5页。

28 《赣西南会议记录——关于组织问题》（1930年10月13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627页。

29 《江西工农革命的记录》（1928年1月到3月），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二七年—

---

九二八年，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1986年，第199页。

30 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33页。

31 《陈奇涵传》，第63页。

32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6卷），第247页。

33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6卷），第226-227页。

34 《陈奇涵传》，第72页。

3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鄂豫皖苏区委员会的信》（1934年1月底于上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39页。

36 章清：《近代中国留学生发言位置转换的学术意义——兼析近代中国知识样式的转型》，《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37 刘学礼：《历史的转折点：遵义会议》，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16-17页。

38 王诤：《从半部电台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通讯部编研室：《红军的耳目与神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通讯兵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52页。

39 《萧劲光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97页。

40 《何长工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302页。

41 肖劲光：《红五军团的初创时期》，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党史资料》（第17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65页。

42 《中共赣东北特委报告附件二：中共赣东北特委通告（第十二号）》（1931年2月11日），江西省档案馆选编：《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1页。

43 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论》，第144页。

44 从籍贯归属来看，分布相对集中的主要有湖南籍148人（22.8%）、江西籍135人（20.8%）、福建籍74人（11.4%）广东籍57人（8.8%）、四川籍37人（5.7%）、湖北籍34人（5.2%）。

45 从教育经历来看，留学生（18.5%）、大学生（15%）、中学生（40%）、师范生（23%）、军校生（40%）、实业生（7%）各有分布，部分知识分子还有多重教育经历。

46 从出生时间来看，从出生于1876年的最长者到出生于1915年的最年轻者，两者相距39年，其中，1905年出生的最多，共67人（10.32%），1903年至1906年出生222人（34.2%）。

---

47 以 1934 年 10 月长征为时间节点来看，参加长征（252 人，39%）与牺牲（157 人，24%）占据大多数。

48 《杨成武回忆录》上，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 年，第 3 页。

49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7 卷，第 162 页。

50 李大钊：《史学要论》（1924 年 5 月），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557 页。